

聂玉环

硕士研究生，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哈尔滨，中国

电影《长安三万里》唐诗英译的海外传播与译介探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产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逐渐走向国际舞台。电影《长安三万里》中的唐诗英译，不仅承载了中国传统诗词与历史文化的精髓，也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关键途径，有利于打破文化壁垒，吸引国外受众目光。本文通过分析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四个要素，重点探讨了译者主体性、归化与异化策略的平衡运用、数字化平台的传播途径，以及西方受众、学术研究者和电影产业从业者等不同受众群体的接纳与反馈，这四个要素的协同作用使得电影《长安三万里》中的唐诗英译取得了显著的译介效果。该研究旨在揭示电影《长安三万里》中唐诗英译的文化传播作用，力求为国产动画电影的字幕翻译提供借鉴，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译介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为国产动漫“出海”提供行之有效的参考策略。

关键词：唐诗英译，海外传播，译介，《长安三万里》

1. 引言

在文化浪潮日益激荡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一系列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烙印的国产电影逐渐走向国际舞台，《长安三万里》作为一部融合了中国传统诗词与历史文化的国产动画电影，不仅以生动的艺术形式将中国的民族精神、文化价值观及审美倾向潜移默化地传达给全球观众，也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国际认同与国家文化形

象的构建，促进了文化的全球共享。电影中的唐诗英译，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涉及的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转化问题，更是文化的再创造与传播。唐诗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而这些文化符号和诗词意象在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如何准确传达原作中的文化内涵，同时兼顾不同文化背景下观众的接受度与审美需求，成为电影字幕翻译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鉴于此，如何通过有效的翻译策略克服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成为译介学研究中重要的议题。文化译介模式，作为分析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语言转化与文化适配的有效框架，为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本文将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四个要素展开分析，探讨电影《长安三万里》唐诗英译在海外传播中的译介效果。通过对翻译主体、文化背景的研究，以及翻译策略的选择、译介途径的设计等多维度分析，本文旨在揭示唐诗英译在电影中的文化传播作用，以期为国产动画电影字幕翻译提供参考，为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译介提供理论支持。

2. 译介学思想与国内译介研究现状

2.1 译介学思想概述

“译”即翻译，“介”即传播。译介与翻译有关，但不局限于翻译。传统的翻译研究主要关注语言层面的转换，强调翻译技巧与策略。而译介学则超越这一范畴，关注译作的传播过程，受众的接收方式及其文化影响等。译介学不仅研究翻译过程中的语言转化，更侧重于文本在跨文化环境中的流动及其所带来的文化效应。传播学家拉斯韦尔认为成功的传播方式应该包括传播主体（Communicator）、传播信息（Message）、传播媒介（Medium）、传播受众（Receiver）和传播效果（Effect）。在翻译研究中，国内第一本译介学作者谢天振教授认为该五要素可分别对应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即文化译介模式，为译介学的分析框架提供了理论基础。译介学强调，文本的翻译只是跨文化传播的一部分，在决定对文本进行

译介之前，首先选择“由谁来译”“译什么”“对谁译”，才能决定翻译过程中“如何译”以及翻译之后“如何传播”，其中每个环节都需要进行把关和操控，因为这些环节都会影响译作在异国文化场域的传播和接受效果。在电影《长安三万里》中的唐诗英译过程中，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四个要素实现了良性互动，最终达到了良好的译介效果，成功推动了中国诗词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破圈出海”。

2.2 国内译介研究现状

国内以译介学为视角的文学研究，通常以文化译介模式为理论框架展开。李伟荣（2016）在《20世纪中期以来〈易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一文中，采用译介主体视角，深入剖析了蒲乐道、孔理霭、林理彰和夏含夷四位代表性译者的翻译理念、方法及其对文化传播的影响。鲍晓英（鲍晓英，2016）则以莫言英译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为例，运用译介学理论，研究了中国翻译文学的译介主体、内容、途径、受众和效果，探索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效译介模式。董海雅（2017）在其研究中，以英国沃克出版公司出版的《青铜葵花》英译本为对象，考察了译介的五个要素，探讨了译者汪海岚如何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使该作品在英国年轻读者中获得认可，进而分析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有效译介路径。尽管上述研究为文化译介模式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文学作品的译介，尤其是经典文学和儿童文学领域，对其他类型文化产品（如电影、动画等）的译介研究仍显不足。其次，现有研究多侧重于译介过程中某一单一维度的分析，诸如译者的翻译策略、语言和文化障碍的克服等，较少从整体传播效果和文化影响的角度进行多维度的综合分析。

在诗歌译介方面，国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系统梳理中国诗歌在国外传播的历史过程。鲁遥（2024）深入探讨了杜甫诗歌在海外，特别是在俄罗斯的传播情况及相关研究成果。毛志文（2024）则梳理并分析了20世纪初至今，俄罗斯重要翻译家对白居易诗歌的译介策略与艺术特色，进一步剖析了

代表性汉学家对白居易生平及其诗歌创作的研究视角与创新。总体而言，国内诗歌译介研究多聚焦于历史梳理，较少有学者从文化译介模式的角度，具体分析译作的传播效果，尤其是对于电影等现代文化产品中的诗歌翻译效果的研究，尚未得到系统的关注。因此，本研究将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四个维度，深入探讨电影《长安三万里》唐诗英译的传播效能，旨在为中国诗词“走出去”提供更加综合、针对性和有效的参考策略，同时填补现有研究在非文学文化产品译介效果方面的不足。

3. 电影《长安三万里》唐诗英译的译介模式与效果分析

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过程，只有对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做出合理、科学的决策，充分了解译介受众的需求与文化背景，才能获得较好的译介效果。电影《长安三万里》中的唐诗英译，作为其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通过分析该片字幕翻译的译介模式，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四个维度出发，深入探讨其文化传播效果，不仅有助于理解电影中的唐诗翻译如何实现跨文化传递，也为其他文化产品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3.1 译介主体

3.1.1 译者背景与翻译理念：译者主体性

译介主体涉及“谁”翻译的问题，包括译者以及出版机构、制作方等在内的赞助人体系。这些翻译发起人的文化认知、翻译理念以及翻译策略直接影响到译作的最终呈现。在电影《长安三万里》中，唐诗的英译由澳大利亚作家、翻译家贾佩琳（Linda Jaivin）负责。自1980年代起，贾佩琳便开始从事中国电影字幕翻译，参与了包括侯孝贤的《悲情城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的《活着》、姜文的《鬼子来了》、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在内的多部经典电影的翻译。近年来，她还参与翻译了《叶问3》、《红海

行动》以及追光动画出品的几乎所有电影字幕。她的翻译风格以精确且富有文化感知力著称，尤其注重语言的流畅与文化语境的结合。

《长安三万里》所涉 48 首古诗，不仅有曾获国际翻译大奖“北极光奖”的译学泰斗许渊冲的经典译本，还有诸多海外汉学家的成熟译文。但贾佩琳并未直接采用这些已有的翻译，而是充分考虑字幕译制空间、观众认知负荷和短时记忆等制约因素，在遵循忠实翻译原则的基础上，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避免文字上的“喧宾夺主”，以便传达唐诗的音韵之美与中华文化的身后底蘊。

在《长安三万里》电影中，贾佩琳的唐诗英译与许渊冲的经典译文在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前者更加注重字幕翻译的简洁性和视觉配合，而后者则注重忠实再现诗句的原意和音韵美感。通过对比两者的译文，可以更清晰地体现出译者的主体性差异以及反映出译者在不同文化和传播语境中的翻译立场。为了便于分析、表达简洁，将贾佩琳的电影官方译文表示为译文 1，将许渊冲的经典译文表示为译文 2。

例 1：人生得意需尽欢

译文 1：When life goes well, be joyous;

译文 2：When hopes are won, oh! Drink your fill in high delight;

许渊冲先生将“人生得意须尽欢”中的“须尽欢”译为“drink your fill in high delight”，在音韵上有较强的节奏感，表达了更丰富的情感层次，具有较高的文学性。而贾佩琳结合电影场景视觉模态，直接采用了“be joyous”这一简短表达，易于观众在短时间内理解，在不影响实质性内容的前提下避免了冗长的表述，使得字幕和视觉效果更紧密配合。因此，贾佩琳的译者主体性体现在译文更注重即时的观众理解与视觉流畅性，旨在确保观众能够快速理解并与影片的视觉信息产生共鸣；而许渊冲的译文则更多保留了原诗的文学风味和情感深度。

例 2：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译文 1: The lone boat slowly vanishes against the sky, I see only the Yangtze flowing to the edge of the world.

译文 2: His lessening sail is lost in the boundless blue sky, Where I see but the endless River rolling by.

许渊冲先生的经典译文在表达方式上较为复杂，语句较长，也更注重音韵的流畅性和对原诗诗意的深度传达。而贾佩琳的译文在忠实再现原诗意境的同时，更加注重了视觉与语境的结合。她将“长江天际流”译为“The Yangtze flowing to the edge of the world”，既具象化了长江的壮丽景象，又增强了诗句的空间感和流动感，符合电影画面中长江的宽广与永恒流动的意境，与电影画面形成复调叙事。

两位译者的不同译文表明，在不同的翻译语境中，译者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翻译策略和风格的选择上，也反映了他们对文化传递与受众需求的不同理解。贾佩琳的译文更具适应性与传播性，而许渊冲的译文则倾向于保持文学性和深度。

3.1.2 赞助人的参与：制作团队的推动与文化传播

《长安三万里》的制作团队追光动画，作为译介主体的赞助人，充分意识到海外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差异以及翻译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关键作用。为了确保电影中的唐诗文化内涵能够精确传达，制作团队对英文字幕的翻译进行了全面的审慎考量。从翻译者的选定到翻译策略的细化，团队全程参与并反复推敲。为此，制作团队邀请了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及翻译家贾佩琳进行字幕翻译，充分借助她在跨文化翻译中的丰富经验。然而，整个翻译过程并非仅仅依赖于单一译者的个人判断，而是经过与追光动画主创团队的多次讨论和调整。在制作团队的指导下，结合电影的艺术呈现和海外观众的文化背景进行调整与优化。制作团队的参与，确保了翻译不仅忠实于原作，还符合电影在全球传播中的文化适应性与视觉效果，从而成功实现了中国诗词文化的跨界传递和观众的认同感，受到了海外观众的高度评价。

3.2 译介内容

译介内容涉及“译什么”和“怎么译”的问题，在以翻译为中介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译者需根据目标语社会和源语社会的意识形态、诗学特征以及审美需求等进行深入对比分析，从而科学地进行翻译内容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在国产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中的诗词翻译中，如何处理文化传递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归化与异化策略的选择，关系到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有效对接。

3.2.1 归化策略与唐诗英译

归化策略在电影《长安三万里》唐诗英译中的运用，主要通过调整源语言的文化元素，使目标语的读者能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源语的诗意与情感，同时减少文化的陌生感，使翻译作品更符合目标文化的认知习惯和语言环境。

例 3：一为迁客去长沙，

I was banished to far-off Changsha,

在原文中，“迁客”具有强烈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但在英语中，直接翻译为“banished”一词，译者避免了“迁客”一词带来的模糊性，减少文化负载，使得译文直接传达了源文化中的悲剧感和流放情节，让目标观众更能理解李白被流放的悲愤与无奈。

例 4：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I play my melancholy flute in the Yellow Crane tower, In spring plum blossoms rain down on River Town.

在中文中，“玉笛”是一个带有特定文化意涵的词，象征着高雅、纯净，而被翻译为“melancholy flute”，直接赋予了乐器情感色彩，使得情感的传达更为直接和符合目标文化的表达习惯。通过在乐器旁加上“melancholy”，译者避免了文化和情感上的距离，使目标读者能感同身受，减少文化隔阂，增强了诗意的表达。

原文中的“江城五月”被翻译为“In spring”，使得季节背景更加普适，去除了具体的地理与文化细节。“梅花”被翻译为“plum blossoms”，使得读者可以理解为所有文化中可能存在的“春花”。虽然“梅花”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但为了让目标语言观众更容易理解，翻译中进行了适当的文化简化。

例 5：梨花醉春色，碧溪弹夜弦。

Pear blossoms drunk on spring's blush, The verdant stream plucks night's strings.

将“春色”翻译为“spring's blush”是通过赋予“春色”更为情感化和视觉化的表现，不止传达了春天的颜色，还传递了春天的情感体验。“Blush”意指面颊泛红，通常带有温暖、柔和的情感色彩。西方文化中，尤其是诗歌和文学作品中，“blush”往往是与青春、美丽和温柔相关联的。这里是暗示春天的温暖、柔美和生机勃勃的气息，帮助目标读者能够感受到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春天形象，减少了文化的隔阂。

这句诗的原文“碧溪弹夜弦”用的是一种非常具有东方色彩的意象，具体表达了溪水与夜晚之间的关系。翻译中的“verdant stream”很好地保留了“碧溪”中的绿色和清澈感，但“弹夜弦”这一描写通过“plucks night's strings”进行了创意的转译。尽管“夜弦”是一个独特的汉语文化意象，译者通过归化的方式，用“strings”这一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性元素（与音乐有关的弦乐）代替原本的“弦”，用“pluck”来描述水流对“夜弦”的拨动，比“弹”这一汉字更能传达出音乐性和画面感，让目标语言的读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诗中的意境。

总结来看，在《长安三万里》中的诗词翻译中，归化策略通过适当调整文化元素，使目标语言观众能够更易理解源语言中的情感与意象，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体验到原作的美感和情感张力。通过简化和调整具体的文化符号，译者有效地减少了文化隔阂，提升了诗意图表达的普适性和情感传递的

直接性。归化策略在保留诗歌情感的基础上，使翻译作品更符合目标文化的认知习惯，从而加强了文化的可接受性。

3. 2. 2 异化策略与唐诗英译

异化策略在翻译中强调保留源文化的独特性，忠实传递源语言的文化内涵与语境。通过保留源文化中的特定文化符号与意象，异化策略让目标语读者感受到源文化的异域魅力。通过这种方式，翻译不仅传达了语言层面的意义，也维护了诗歌原有的文化特征和艺术感，避免过度本地化对原作内涵的削弱。

例 6：哥舒夜带刀。

Geshu is armed day and night.

在翻译中，“Geshu”直接保留了源文化中的名字哥舒（吐番部落的领主），而“armed day and night”将原文的“带刀”抽象化为“armed”，并进一步用“day and night”强调其持续的警戒状态。这里的翻译未做本地化处理，而是保留了“Geshu”的名字，这不仅突出了人物在源文化中的特定身份，而且在英语语境下，也没有进一步解释“带刀”究竟指什么样的武器，而是通过“armed”这一更为宽泛的词语保留了其文化背景。这种翻译方式强化了源文化中对哥舒人物特征的特指性（即吐蕃部族的领导人物），而目标语言读者只能通过上下文猜测其具体文化背景和象征意义。这体现了典型的异化策略，通过不完全本地化，使得目标语言读者意识到这种文化的“陌生性”，从而激发他们对源文化的兴趣和探究欲望。

例 7：不敢过临洮。

But dare not cross Lintao.

在翻译中，“Lintao”作为地名被直接保留，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本地化处理，确保了原作的文化特色得到保留。地名的保留使得目标语言的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感知到中国历史背景中的特定地方和历史时刻，同时也激

发读者去探索更多的文化和历史信息。通过不做解释或翻译，“Lintao”保持了其“异国”的特性，使目标读者必须通过背景知识来理解其文化意义。

例 8：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A loud stormy night, Countless petals fall.

通过使用“loud stormy night”而非“wind and rain sounds”或“spring storm”，强化了自然景象的震撼感。这一翻译不仅呈现了风雨交加的夜晚氛围，也使目标语言的读者更能感受到源语言中风雨的轰鸣声，从而加深对自然变化的感知。通过这种异化策略，译者避免了过度本地化，保留了源文化中的音响特征与情感张力。

同样“Countless petals fall”的翻译，保留了中文中“知多少”的模糊语气和“花瓣”的细腻意象以及诗人对于自然变化的感叹和无奈。通过“countless”一词的运用，表达花瓣纷落的数量感和自然的不可抗拒性，加强了诗人对春天的感慨和对花朵凋谢的无尽忧伤，保持了原诗中的诗意和文化色彩，使目标语言的读者能够感受到源语言中的繁复景象。

总结来看，这里的异化策略体现的是情感强化的作用。例如“loud stormy night”和“countless”的使用，不仅呈现了春夜的风雨，还增强了原诗中对时光流逝和自然变化的情感张力，避免了过度本地化，使目标语言读者能够更直接地体验到源语言的情感厚度和文化氛围。

3.2.3 翻译策略的文化功能

在《长安三万里》电影字幕的唐诗英译中，归化和异化策略的交替运用体现了翻译在文化功能上的多重作用。翻译不仅是为了实现语言的转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恰当的策略选择，在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搭建桥梁，促进文化的跨越式传播。

然而，目前我们还处于未完全走进“中心”的情况下，即尚未完全实现不同文化系统间的平衡对接。通过上述实例分析可见，电影《长安三万里》中的诗歌翻译仍然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由于电影的传播目标是让外国受

众更容易接受中国文化，因此归化策略的使用较为频繁。归化策略通过调整诗歌中的文化元素，使其更符合目标语言观众的认知和文化习惯，增强其亲切感和认同感。这种策略有助于缩小文化差异，减少外来文化的陌生感，使翻译作品更易融入目标文化的语境中。异化策略则主要体现在保留一些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地名和人名上，而对于大多数诗歌意象，翻译更倾向于采用能为外国受众所理解的归化策略。因此，通过这两种策略的交替使用，电影《长安三万里》能够在全球传播过程中有效地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确保观众能够在文化差异的情况下仍然产生情感共鸣，保持了文化的适配性。

3.3 译介途径

译介途径是翻译产品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走向目标读者所依赖的媒介渠道和信息载体，它不仅涵盖翻译活动本身，还涉及作品的发布、推广和受众的接受过程。对于国产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而言，其“破圈出海”的成功不仅源于精准的翻译，更得益于数字技术的赋能，将新媒体技术、中国传统水墨画风、成熟的音效系统与唐诗英译紧密结合，构建了多元化的译介途径。这些途径使中国传统文化与电影内容得以深入目标语言市场，助力中国优秀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认同。

3.3.1 数字技术与新媒体平台的结合

在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海外传播过程中，数字技术与新媒体平台的结合构成了其“破圈出海”的关键译介途径，成为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强大引擎。通过数字化技术与国际流媒体平台（如 Netflix、Amazon Prime、YouTube 等）的联动，电影突破了地理和文化的限制，迅速实现了跨境传播。电影的海外传播不仅依赖传统的线下渠道，还巧妙运用了流媒体平台的全球化优势，使其能够快速抵达国际观众。此外，《长安三万里》的海外传播战略可以概括为“借船出海”与“造船出海”双管齐下的策略，进一步强化了译介途径的多样性。通过借助国际平台的强大分发能力，电影实现了跨文化传播；同时，通过本土企业建设海外平台，进一步深化了译介途径

的自主性和持续性。这种双重策略不仅增加了电影的全球曝光度，也为电影的文化内容提供了更多样的传播渠道。总结来看，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型译介途径，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开辟了新的前景，也为电影文化的全球传播提供了宝贵经验。

3.3.2 社交媒体与网络社群的传播力量

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观众的评价与讨论成为电影文化传播的重要译介途径。《长安三万里》通过微博、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等平台，巧妙利用社交媒体的即时性和互动性，成功实现了广泛的观众互动与口碑传播。这些平台不仅为电影提供了与全球观众直接沟通的渠道，还促进了唐诗的翻译和文化内涵的扩展讨论，增强了电影内容的跨文化传播效力。观众在观看电影后，往往会分享对诗词翻译的理解，并讨论其中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对唐诗的独特文化符号和意象的解析，成为电影海外传播的有效推动力。此外，影片在海外上映后，不少海外网友自发助力影片宣传推广。优兔、美国华人媒体 RADII、知名社区红迪网（Reddit）等平台影评人纷纷点赞，盛赞该片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带动了更广泛的文化讨论，使电影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同。通过社交媒体和网络社群的协同作用，电影《长安三万里》的译介途径得以多元化，拓宽了文化传播的路径，为中国诗词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型的译介经验。

3.4 译介受众

译介受众是跨文化传播活动中的目标对象，也是传播效果的最终实现者。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受众的文化背景、语言能力、审美取向等因素直接影响到译介产品的接受度和传播效果。在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海外传播中，西方受众、文化爱好者以及学术群体、电影产业从业者，都是其重要的译介受众。这些受众不仅关注电影本身的娱乐性和艺术性，还对电影中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和诗词的翻译策略产生浓厚兴趣，

只有通过译介受众的参与和接受，我们才能实现文化“走出去”的意义和目标。

3.4.1 西方受众的文化接受度

电影《长安三万里》在海外传播过程中，不仅保持了东方美学的精髓，还巧妙地抓住了“唐诗”这一文化符号，通过引导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成功地实现了与西方受众的文化对接。影片通过对高适人生轨迹的刻画，凸显了中国传统美学儒道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理念与西方哲学中，尤其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的“诗意栖居”这一人类理想生存状态十分相似，这种共通的审美取向得到了译介受众的主体西方受众的认同与共鸣，从而促进了文化互鉴的深入。与其他国产动漫电影相比，诗歌体量大、诗意图涵饱满的《长安三万里》，如何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与要旨准确完整地传递给西方受众，是中国电影打开海外市场必须解决的难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搭建好国际传播的语言桥梁，通过恰当的翻译策略（如归化和异化），运用中英双语字幕等方式，可以有效缓解语言和文化障碍，降低海外受众的理解难度，从而促进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简而言之，电影《长安三万里》通过细腻的文化叙事、精准的情感传递和跨文化的共识构建，实现了与西方受众的情感链接，强化了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新范式。

3.4.2 学术研究者与文化学者的文化共鸣

电影《长安三万里》在全球传播过程中，学术研究者与文化学者作为重要的译介受众群体，在推动电影文化传播和促进跨文化理解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学者通常来自中国文化、东亚研究、翻译学、电影学、比较文学等领域，他们通过对影片的深度解读，探讨影片在全球传播中的文化意义和翻译策略，推动影片在学术界的讨论和认同。《长安三万里》不仅是一部艺术作品，更是中华文化传播的载体。学术研究者从电影的文化背景、叙事方式、翻译精准性等方面进行剖析，特别是唐诗英译如何传递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髓，这些都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话题。文化学者则关注影片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表现，如何突破语言和文化障碍，做到既忠实于原文化又适应目标文化的需求。通过学术论文、书籍、讲座以及国际学术会议等形式，学术研究者和文化学者不仅分析影片的艺术与文化价值，还探讨影片所带来的文化对话和文化互鉴的可能性。他们的研究成果为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更多受众的文化理解和认同提供了框架和指导。因此，学术研究者与文化学者不仅是《长安三万里》译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译介受众群体，也是推动电影传播与文化认同深化的重要力量。通过他们的学术讨论和研究，影片的文化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解读和传播，进一步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对话与融合。

3.4.3 电影产业从业者的市场认同

电影产业从业者也是译介过程中的潜在受众群体。该译介受众群体通常包括制片人、发行商、编剧、导演、市场营销专家以及海外电影节的组织者等，他们不仅关注电影的艺术价值，还注重其市场潜力和商业可行性。在《长安三万里》国际传播的过程中，电影产业从业者的参与为影片的国际市场认同提供了关键支持。通过与国际发行商和流媒体平台的合作，如 Netflix、Amazon Prime 等，进一步扩大了其国际受众群体。2023 年 10 月 6 日，电影《长安三万里》宣布在北美上映，上映 10 天累计票房收入达到 216280 美元，显示出较强的市场吸引力。这一成绩不仅标志着电影在海外的商业成功，也反映出电影产业从业者这一译介受众群体在推动中国电影进入国际市场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电影产业从业者的市场认同为《长安三万里》的全球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基础，他们通过整合资源、优化推广渠道，使电影得以突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获得全球观众的关注和认可，为未来的中国诗词文化传播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和路径。

4. 结语

电影《长安三万里》中的唐诗英译取得了显著的译介效果，得益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四个要素的协同作用。首先，译者贾佩琳的翻译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凭借深厚的语言功底和对中西文化的深刻理解，成功将唐诗的美学意蕴与中国传统文化传递给国际观众，体现了译者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主动性与调适能力。其次，在译介内容方面，影片的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辅以适度的异化，通过灵活地调整语言和文化背景，使原作的文化精髓在目标语言中得以有效再现，并能为目标受众所接受。这种平衡的翻译策略促进了影片文化内涵的顺利传递。此外，译介途径的数字化转型为电影的全球传播提供了有力支持。借助流媒体平台，影片跨越了时空限制，突破了传统传播途径的局限，迅速触及全球观众，提升了其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最后，译介受众的多元性也是该片译介效果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影片不仅吸引了西方受众、学术研究者和文化学者，也成功触及电影产业从业者，三类受众的不同需求促使翻译策略在满足文化传递的同时，也扩大了文化对话的范围。未来的译介学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更加精准地运用翻译策略，结合数字化传播工具，实现更加高效的跨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 鲍晓英. (2014).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 董海雅. (2017).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在英语国家的译介模式探析——以曹文轩《青铜葵花》英译本为例[J]. 山东外语教学, 38(05), 88-95.
3. 李伟荣. (2016). 20世纪中期以来《易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7(03), 87-95.
4. 李奕华. (2019). 新时代黄梅戏海外传播中的译介探究 - 基于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7(02), 149-156.
5. 鲁遥. (2024). 杜甫诗歌在俄罗斯的译介及传播策略研究[D]. 大连外国语大学.
6. 毛志文. (2024). 白居易诗歌在俄罗斯的译介与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03, 79-88.
7. 米聆瑞. (2024). 从生态翻译角度看国产动画电影字幕对中国元素的表达 - 以《长安三万里》为例[J]. 今古文创, 47, 103-106.
8. 邵璐. (2022). 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框架、思路与方法[J]. 扬子江文学评论, 06, 17-22.

9. 辛红娟, 杨贺. (2024), 动漫电影《长安三万里》“出海”的国际传播逻辑探究[J]. 对外传播, 08, 37–40.
10. 徐庆莉. (2023). 中国原创儿童绘本的译介效果分析[J]. 东南传播, 11, 93–96.

Nie Yuhuan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nieyuhuanbonnie@163.com*

A STUDY ON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ANG POETRY IN THE FILM CHANG A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Chinese domestic films, as vital carrier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re increasingly stepping onto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ang poetry featured in the film Chang'an not only embody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but also serve as a crucial channel for promoting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a's rich cultural heritage. These translations help break down cultural barriers and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his paper analyzes four key elements – agents of translation, content of translation, modes of dissemination, and target audiences – to explore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he balance between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strategies, the use of digital platforms for dissemination the reception and feedback from various groups such as Western viewers, academic researchers, and film industry professionals. The interplay of these four aspect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notable succes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ang poetry in Chang'an.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role of these translations in cultural transmission, offering insights for subtitle translation in Chinese animated film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helping domestic animations reach global audiences.

Key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ang poetry, overseas dissemination, translation and mediation, Chang'an.